

辜胜阻 著

创新驱动
与经济
转型



人民
出版
社

创新驱动战略
与经济转型

辜胜阻 著

●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陈 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转型/辜胜阻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

ISBN 978-7-01-011748-5

I. ①创… II. ①辜…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②中国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IV. ①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2687 号

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转型

CHUANGXIN QUDONG ZHANLÜE YU JINGJI ZHUANXING

辜胜阻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25

字数:368 千字

ISBN 978-7-01-011748-5 定价:54.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作者简介



辜胜阻，男，汉族，湖北省武汉市人，1956年出生，经济学博士，经济学和管理学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国家有突出贡献的留学人员。现任全国人大常委、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评审组成员、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教育部科技委管理学部学部委员，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兼职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曾任九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湖北省副省长、武汉市副市长。他1986年至1988年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进修硕士学位课程；1989年至1990年任日本国日本大学客座教授；1992年至1993年任美国密西根大学访问教授；1994年任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客座教授；1996年至1997年作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在美进行合作研究和讲学。



辜胜阻教授先后主持了20余项国家级、省部级及国际合作项目。出版了《危机应对之策与经济转型之道》、《民营经济与创新战略探索》、《民营经济与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热点问题探索》、《新经济的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中国跨世纪的改革与发展》等专著20多部。在《求是》、《中国社会科学》、《中国软科学》、[美]《人口与发展评论》、《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刊和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他有20多项研究成果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教育部优秀成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成果特等奖等国家级和省部级奖励。辜胜阻教授曾获第三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1996年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年入选国家“跨世纪人才工程”。

辜胜阻教授依托其学术研究成果，围绕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中小企业与民营经济发展、创新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等经济社会热点问题参政议政，先后九次登上全国政协大会和政协常委会讲坛发表政见，多次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代表大会上建言献策，引起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他的观点、政见及相关学术研究，经由各大媒体得以广泛传播；他向国家提出许多项重要建议，已经为政府有关部门在政策制定中所采纳。

代 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着力

成思危

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原来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问题逐渐显现。特别是2008年年底，国家启动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实际上到2009年年底，政府投资是6800亿元，银行信贷大约增加9.6万亿元，加起来实际上远远超过4万亿元。根据我的研究，如果没有这个经济刺激计划，我国2009年的增长率可能只有2.4%。由于有了这个经济刺激计划，达到了9.2%，实现了“保八”的目标。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过度的经济刺激也带来了明显的负面效应。一是产能的过剩。据报道，在24个主要产业部门中，有21个产能过剩。钢铁行业，目前有6亿多吨产量，但是过剩的产能有2亿吨，如果每吨产能的投资以5000元计算，就是1万亿的资金。这笔投资在投入的时候拉动了GDP，因为投入时要购买生产资料，还有一部分投资会通过工资转化成为消费。但是它以后就再也不能继续拉动GDP了。二是库存的积压。由于外需的减少和国内的产能过剩，以及产品的内需不足，产品就会积压。但是产品积压从GDP上反映不出来，因为我国的GDP是用生产法计算的，生产出来就算，因此不能反映库存的情况。这和支出法、收入法计算的结果不完全是一样的。三是投资效益的下降。衡量投资效益有两个直观的指标。一是投资的弹性，就是投资增长1%，GDP增长多少。一般来说，投资的弹性系数至少应该是0.7。但是我国2009年投资增长了30.1%，GDP才增长了9.2%，投资的弹性只有0.3。

另一个较明显、直观的指标是投资转化率，就是投入1元钱，能增加多少元GDP（以不变价格算）。我国这个指标最高的时候曾经接近过1，但是近几年来，都是在0.25左右。当然投资效益较低可能有“铁公机”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周期长、收益慢的原因，以及一些无效的投资。即使考虑这些原因，我国的投资效益的降低还是严重的。四是环境成本的大量增加。我们曾专门测算过，2005年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13.5%。而当年我国GDP增长率仅为10.4%。这实际上是把我们这一代对环境的债务，留给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这种发展模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五是大量货币投放造成的问题。首先就是引发通货膨胀。所谓通货膨胀是指货币供应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要，造成了货币购买力的持续下降，或者说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升。这个问题在2010年和2011年是比较明显的。其次就是地方债务的迅速增加。当然有人说，地方债务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因为中央政府还有很大的财力，部分省市也有一定财力。但是如果都由中央政府来“买单”的话，那不就意味着鼓励赖账吗？如果变成银行坏账的话，那不就变成老百姓的损失吗？危险就在这里。再有就是资产泡沫的上升。2009年上半年本来经济情况不好，但是股指却从1664点上涨到了3300点，经过我们分析和测算，原因就在于，2009年1季度，我国银行信贷增加了4.6万亿元。4.6万亿元的信贷大部分流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手中，他们没有收益较好的项目，也不甘心把钱拿在手中，于是大概有1.9万亿元进入股市，结果抬高了股指。但是由于整体经济形势不好，到2009年下半年，大约有1.1万亿元资金撤出，股指就跌下来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做到三个“外转内”

中央认真地总结了2009年的经验教训以后，提出一定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做到三个“外转内”。一是从过多依靠外需，转向更多地依靠内需，特别是居民的消费。要依靠国内消费，首先要提高老百姓的购买力，让大家有能力消费，这就需要有制度性的安排，包括让人民群众的收入和经济增长同步，工资与通货膨胀联动，职工

报酬随劳动生产率上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适度推进信贷消费等；其次要改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大家敢于消费，不会为子女上学贵、看病贵、养老难等因素而不敢花钱。更重要的是，我国的企业要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让大家愿意消费。中国需要有更多的“乔布斯”，总是能不断推出新产品吸引大家消费。因此消费拉动的关键是要让人民群众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当然，我们说更多地依靠内需，并不是说不重视外贸，而是要注意在外贸产品结构上从低端产品逐渐向高端产品提升，既要引进来也要走出去。二是从外延型增长转为内涵型增长。外延型增长就是做加法，比如城市发展“摊大饼式”的扩张，这就是外延型的增长。今后城市发展不能走这样的道路，而是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内涵型增长现在国外讲得比较多的就是智慧城市，包括精明增长、绿色建筑等。精明增长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合理利用土地；另一方面是调整产业结构。内涵型增长主要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及降低环境成本等方面来实现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就是要降低物质消耗，提升每一单位物质消耗所创造财富的水平，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同时把这些财富合理地分配给全体人民。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比投资拉动增长的难度要大得多，但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另外，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和降低生产的环境成本也很重要。三是从外生性动力向内生性动力转变。所谓外生性动力，主要是指靠依靠银行贷款、政府的优惠政策等推动发展，这当然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调动内在的动力来更好地实现发展。我认为，一要提倡创新，鼓励大家能够为企业的发展、为地区的发展，提供各种各样的建议。创新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包括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内容。二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的素质。通过教育，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科技和文化水平，也可以培养创新能力，这两点是至关重要的。经济可以保证今天，科技可以保证明天，但只有教育才能保证后天。投资教育就是投资于我们的未来。三要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优势。

改革攻坚要处理好四大关系

我国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回顾改革的历程，可以看到层出不穷

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我国的快速发展。我认为制度创新是改革的核心。制度创新经常成为影响改革进一步发展，甚至转变发展路径的主要因素。现在我国的改革可以说已进入了深化和攻坚的阶段，主要有以下四个关系或矛盾需要认真处理。

一是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做长期的努力。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就是说执政党的主张要通过法定的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一旦变成国家意志以后，任何党派、任何个人都必须遵守。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我们还是发现在法治和人治之间存在着矛盾和问题。我曾经讲过，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这些年来宪法经过多次修改，不断完善，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做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这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违宪可以说是最大的违法，但是我们现在还未能真正树立宪法的权威。需要进一步根据宪法来审查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推出的法规，违反宪法的一定要撤销。依法治国首要是依法行政，也就是依法治官，我国政府对民众处于强势，如果政府官员不守法，如何能让民众守法？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还会因追求政绩或决策失误等原因而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众所周知，腐败问题是严重影响我国发展的一个问题，尽管这些年来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腐败分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腐败还必须靠法治。

二是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政治学中一个永恒的课题。我认为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了。就是说一方面要用市场经济的手段去追求经济发展的效益和效果，因此我们要大胆地学习国外各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几百年来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好的经验和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运用。另一方面，我们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如果只讲效率不讲公平，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不稳定，就难以保证效率；但是如果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就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由此可见，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而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低

水平的公平，因此二者需要兼顾，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三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应该密切结合起来，而不是相互较劲。我讲过，政府的宏观调控不应违反市场经济的三个基本规律。第一，不应违反价值规律。价格不应过分背离价值，采取限价或者补贴的方法都只能是权宜之计，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限价的结果可能就会减弱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市场的供求关系的扭曲。而补贴的结果就可能给有些人提供钻空子的机会。第二，不应违反供求规律，我们应该相信市场的信号，不要用自己主观的判断来代替市场的信号。我国的电力市场就曾经发生过这个问题。有一段时期有关部门认为电厂建设多了，因而限制电力的发展，结果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工厂在夏天停三天开四天，老百姓家里的空调也因缺电而不能用，只好到人防工程中去避暑。第三，不应违反竞争规律。我们以前老是用“防止重复建设”来限制市场的新进入者，实际这个提法是不对的。没有新的市场进入者，没有新的竞争者，市场是不可能进步的。所以后来的提法改成了“防止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个提法就科学了。政府不应保护垄断，限制竞争，而应该鼓励竞争。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实现技术的进步，最后才会使消费者得到更大的实惠。

四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这也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我国在集权和分权方面都经过了一些改革，但尚未完全克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端。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中央要有集中的力量和权威，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给地方一定的事权。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在集权和分权的处理上引导了地方政府的行为。地方政府之所以追求GDP，当然追求政绩是一个原因，但在财政分灶吃饭的情况下，追求财政收入也是一个原因。在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中要考虑到，当过分集中权力时，也会把矛盾过分集中；当过分集中财力时，也会把负担过分集中。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巧妙的处理艺术。

【注】 辜胜阻同志的新作《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转型》即将出版，他找到一篇我在前不久的一次讲话的速记稿，希望能作为该书的代序。我很赞赏他多年来长期进行大量调查研究并积极建言献策的精神，因此欣然同意。原速记稿中错漏之处甚多，已经由我加以补正。

前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方向与新动力*

辜胜阻

在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召开的十八大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了新设计和新理论，十八大报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设定了体现以人为本的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的新量化目标，强调质量效益为发展的立足点，要求将“创新驱动”作为新经济发展方式的新动力，提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理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四化同步”思想，以及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新观点，为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明了前进的新方向和新动力。

一、十八大报告对既定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新的量化。报告提出 2020 年居民人均收入要实现倍增，这体现了经济发展要以人为本和民富优先的理念，是报告最引民众关注的一个亮点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多次党代会的既定目标和任务，但对小康社会的量化是各不一样的。十六大对小康社会的量化指标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就是要在 20 年，从 2000 年到 2020 年实现 GDP 翻两番。由于我

* 王敏、李洪斌协助研究。

们的增长速度超出了预期，在十七大的时候提出了人均 GDP 翻两番，量化指标由“总量”改为“人均”。两次大会均未对居民收入增长提出具体量化目标。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虽然首次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但也未提收入增长具体量化目标。十八大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就是首次明确提出居民的收入要在十年的时间里实现倍增，到 2020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我们要从四个方面理解居民收入倍增的内涵及其意义：一是居民收入不仅要倍增，而且要同“GDP 翻一番”同步；二是把居民收入作为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体现了以人为本和民富优先；三是用十年时间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并非不可企及的“高指标”，而是在中速增长假设前提下切实可行、容易做到的；四是在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的过程中，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问题。

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上都存在制约分配公平的缺陷，由此产生了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过低并呈现不断下降趋势、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企业薪外各类附加费过重挤占员工加薪空间等问题，收入分配格局存在严重失衡。收入分配失衡使居民难以均衡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再加上上学难、看病贵、住房难、养老负担重等问题成为阻碍居民消费的障碍，影响居民的消费预期，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低迷和内需不足。这也是我国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出现内需与外需失衡、投资与消费失衡的重要原因。收入分配失衡还容易诱发社会不满情绪，影响生产生活秩序，有损社会公平正义，甚至会使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型。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这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当前的紧迫工作。要提高居民所得，就要降低政府所得或降低企业所得，这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亮点，也是最大难点。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从长远来看，要提高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两个提高”是对国家、企业、居民三方利益的重大

调整。推进收入分配改革要按照“十二五”规划提出的“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大对高收入者税收调节力度”的政策取向。具体而言：一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构建“橄榄型”财富分配结构。从全球视角来看，“橄榄型”社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中间阶层的壮大，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减少由这种差距引致的对立情绪和社会矛盾。因此，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旅游、物流和IT等现代服务业，通过经济服务化培育大量“白领”阶层。要出台更多的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鼓励创业创新，让更多的就业者变成创业者，培育一大批中小“老板”。要通过推动城镇化进程，让进城农民工变市民，促进底层农民工向中层的上升流动，改变弱势群体家庭贫穷状况的代际复制。要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充分考虑家庭综合税负能力，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计征、抵扣和返还，切实减轻中低收入者税负。要将教育、医疗、保险、养老金等必要、重大支出作为税收减免和抵扣的重点，让中产阶层的收入增量能够拿得到、存得住、经得起花。要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尽快出台物权法配套法规，让农村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推进农村宅基地、住房、土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使农民能够充分享受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要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建设，鼓励金融产品创新，提升居民理财水平，拓宽居民金融投资渠道，提高居民的股息、利息、红利等财产性收入。要研究专利和企业家才能这两大要素通过“技术资本化”和“管理资本化”参与分配过程的有效实现形式和途径。二要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健全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发挥工资指导线、劳动力市场价位、行业人工成本信息对工资水平的引导作用。要加强对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落实情况的监督，保护劳动者在分配中的地位和合法权益。深化矿产资源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合理设置补偿费比例和中央地方份额，使中西部的矿产资源优势能惠及当地普通居民，缩减地区收入差距。三要加大对高收入者的调节力度。加强对收入过高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国有企业应搞好企业内部分配，正确安排各层次劳动者的薪酬分配关系。利用法律、经济和行政

手段，严厉打击非法收入，取缔不合法收入。

二、十八大报告强调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即年均7%的中速增幅，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立足点从速度至上和规模扩张转向“质量和效益优先”的轨道

我国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已经发生三次转变：第一次强调“快”字当头——强调“又快又好”，在这种基调下，经济增长速度是两位数的增长；第二次是“好”字当头——强调“又好又快”，党的十七大以来一直坚持这一总基调；第三次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这是当前经济工作的总基调。“稳”是一位数增长——七上八下。在没有水分的七点五的增速下，大力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是“稳中求进”的要义。当前，美国经济复苏缓慢，欧元区经济陷入萎缩，全球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国内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过去高速增长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掩盖的低效率问题将会逐渐暴露，实体经济要素流失严重，中小企业盈利能力下降，生存困境加剧。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十八大报告指出“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强调必须“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处理好“稳增长”和“促转型”之间的关系。当前，要利用经济下行的压力，推动经济转型。不能再靠无效投资和放松房地产调控的“老办法”来稳定经济增长，而是要采取新的“组合”型政策，培育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一方面要优化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分配与投入，引导产业升级的方向；另一方面要注重居民生活的质量，努力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让所有人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具体而言：一要巩固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营造“让勤劳做实业能富，创新做实业大富”的市场环境，以实体经济的创新引领经济的持续发展；二要靠有效投资特别是扩大民间投资，通过减税费的积极财税政策调

动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让其遵循经济规律“自然成长”；三要培植新的消费热点，探索将出口退税转为居民消费补贴，提高居民收入比重，使居民消费成为稳增长的持久动力；四要充分发挥欠发达地区的后发优势，在“东慢中快”和“东慢西快”的形势下，把中西部打造成“稳增长”的新引擎；五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寻求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六要促进出口多元化，努力实现外需稳定。

三、十八大报告揭示了新发展方式的新动力。报告指出，我们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首次提出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经济学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发展需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等四个阶段。创新驱动是相对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而言更高级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大量资源消耗和大规模政府投资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但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和要素结构的转变，原有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优势开始减弱，“要素投入驱动”无法持续，使得原本依靠“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外延式、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是要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创新驱动”，从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转向靠深化改革来形成“制度红利”，促进经济内生增长。

经济发展要实现创新驱动，首先必须深刻理解创新的内涵。认识创新，要防“创新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庸俗主义”把创新庸俗化，又要避免把创新看成高不可攀、无所作为的“虚无主义”，将创新神秘化。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通过新组合而产生新利润的活动，包括新产品、新生产方法、新市场、新材料供给、新管理五种形式。“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认为，“创新”一词应该做广义的解释，它不仅是新技术，而且也是新方法或新态度。“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提出，创新不是一个技

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社会的概念。因此，广义的创新还包括体制、机制、法治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即通常所说的改革。著名管理学家成思危教授认为，创新是指引入或者产生某种新事物而造成变化，大体有三种主要类型，即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创新是多层次的，高端创新具有革命性、颠覆性、破坏性，而中端、低端创新则具有渐进性。

落实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关键要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意志变为企业行为。我们的调查表明，企业创新有四大瓶颈：一是“动力不足，不想创新”，因为激励机制缺失，创新无利可图；二是“风险太大，不敢创新”，因为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创新往往是“九死一生”；三是“能力有限，不会创新”，特别是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创新人才瓶颈；四是“融资太难，不能创新”，融资体系不完善使企业创新面临资金约束。当前，创造环境让企业创新有利可图，比打造“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更为重要。我们现在有很多优惠政策支持企业创新，但实施起来很难。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让企业创新步履维艰。所以如何营造“做实业能致富，创新做实业能大富”的环境非常重要。具体而言：要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完善有关财税政策，解决企业不想创新的问题；完善风险分担机制，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激励，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创新氛围，让企业敢于创新；完善创新合作机制，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进行战略联盟，实施有效的产学研合作，推进开放创新，让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的企业在互惠共生的环境中提高创新能力；重构为创新服务的金融体系，为企业创新建立良好的融资平台。

推进创新驱动战略，还需要从宏观层面进行全面部署和战略规划。要全面整合创新资源，推进技术创新工程，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本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提高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抢占科技发展战略制高点；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高技术化，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利用

人才创业创新带动先进技术的应用。

四、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理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特别强调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观，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都会有市场经济理论上的重大创新。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82年的十二大报告，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必要的、有益的补充”。1992年十四大提出“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997年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7年的十七大提出了对不同的市场主体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两个平等”，这是所有制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飞跃。十八大报告的经济理论创新是把经济体制改革核心定位为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两只手”的关系，提出不同市场主体竞争要实现“三个平等”即“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特别是“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不同所有制主体在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有六种表现：一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许多大中型国企获取稀缺资源既容易又便宜，如获得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电网、电讯等特许经营权，政府投资项目等等。二是资金要素使用的不平等。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经营条件上面临着显著的融资可获性和融资成本的差异。国企以国家信用作背书，更容易从正规金融体系中获得资金。而大量民营企业却因为规模小、实力弱、经营管理机制落后、市场稳定性较差、资信等级不高、可抵押担保品较少等条件约束，

常常遭遇银行等金融机构“重大轻小”、“嫌贫爱富”的“规模歧视”和“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融资渠道狭窄使得民企总体融资成本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三是一些企业在一些上游产业、基础服务业形成寡头垄断，获得超额利润。一段时间以来，两家利润最好的国企利润之和超过民企五百强的利润总和。四是在竞争性行业，市场准入和行政审批“两道门槛”，民企比国企承担更多税费负担，造成国企和民企的不平等。一些地方，民企承担着比国企更多更重的税费负担，造成竞争过程中“民企带着枷锁与国企赛跑”。五是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地方政府建立和引进了很多新的国企，对民企产生“挤出效应”。六是在财产权的法律保护方面，对不同所有制主体的保护离“同等保护”的目标要求还有距离。

落实平等竞争观需要深化改革，利用改革形成新的制度红利。过去三十年，我国经济的辉煌除了得益于“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资源红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得益于通过改革产生的“制度红利”。过去三十年，第一个十年是农村农业改革所创造的制度红利，第二个十年是国企改革的“黄金十年”推动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第三个十年改革主要是加入WTO以后“开放倒逼改革”的十年。三个阶段的改革创造的“制度红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辉煌，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改革是阶段性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旧红利不可避免会消失。为此，十八大报告把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战略，开启了新一轮改革“大门”。

当前，我们要以落实“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观为契机，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新“制度红利”，激发新一轮经济增长活力。要进一步打破所有制障碍，破除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遭遇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营造和谐有序、自由竞争、公平发展的市场环境。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和灵魂，实现公平竞争首先要保障不同市场主体“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实现不同市场主体在法律上“平起平坐”。政府要对不同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落实“三个平等”的公平竞争观需要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一要加快要素市场改革，建立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创造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前提条件。当前，要完善要素自由流动机制，进一步清理各种要素市场准入条件中有关所有制限制的条款，打破